

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

黄传会卷

太阳·烛光·天平



四川人民出版社

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

太阳·烛光 ·天平

黄传会/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成都



不单单要“直面现实”

——《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总序

文 怀 沙

握管面对稿笺，心头洋溢敬意。因为我在此刻——走笔行文之前，很想表扬一位远在 14 世纪中叶、并不知名、但确有眼光的文学编辑——朱右。正是这位朱右先生检阅了作手如林的唐、宋两代古文（散文）家，以他高明的鉴别力，从中推举最有代表性的“八先生”，并编选“八先生”的文章。这“八先生”就是被后世公认的“唐宋八大家”。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继承朱右观点的唐顺之和茅坤。特别是编成一百四十四卷《唐宋八大家文钞》的茅坤。这些人的功劳往往不被人知或罕为人知，所以愈加令人尊敬。

当我得知四川人民出版社又在做好事，即将出版《当代纪实名家精品文库》，真使我高兴；命我作序，安敢辞？文库主编者出诸审慎，仅推出当代纪实名家十位。较之唐宋两代之八家，不可谓少。全书计三百万言，内容广及史海钩沉，社会热点，生态保护，人物造像等等……可算得上洋洋大观已乎哉！



怀沙老矣！比年自甘“述而不作”。细想起来却又与纪实家们小有缘份。今春以降，关于纪实文学的话题，我也曾在众人稠座中“述”过两回，一次是徐刚的《倾听大地》的座谈会，另一次是韩作荣的《城市与人》的研讨会。概而言之，窃以为凡来自真情实感者便具有动人心魄的“质”，倘益之以“文”采，必能产生美的震颤。一般而言，生活本身就是真实的。生老病死，能不真实吗？上班下班买菜做饭，能不真实吗？可是这只是作为一般意义而言，为什么呢？因为相形之下那标志着特定内涵的孩子们的哭与笑更真实一些；贫困山区田野老叟诉说的生活艰难要更真实一些。不知纪实家们以为然否？

或许，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尽管生活中处处有真实，可是作为作家们笔下的真实有时却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这就需要追索，需要选择。或如历史，经过了岁月的沉淀更能见到真人真性情；或如现实生活，在离开喧嚣与城市的大漠、旷野、山沟里，由生存环境的艰难与负重所引发的忧患，更加值得我们去深刻认识和表现。

总之，“直面现实”很不容易。

我个人认为：纪实文学所“崇”者“实”，而“实感”必来自“真情”。但“实事求是”如落到实用主义的市侩手中，就会被歪曲得不成样子。这四个字也需要从另一侧补充，使之完善。我曾杜撰四字成语：“虚情索非”。前者为阳，后者为阴；前者在表，后者在里。如能洞察、探究虚情之奥秘，寻索其“非”之所以然，始可得“实是求是”之精髓所在乎？

岁月之更新有时使我这样的老人常有目不暇给之憾，因此我



爱翻阅纪实类作品，但既非真实亦非文学的时有所见，如同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商品却也一律包装着“名牌”的标号。纪实文学从文学的门类而言，可以称之为名牌，盖因其内容的真实且又有文学的氛围、情趣、意境及格调，便能和读者更为贴近、交流。纪实家中的高手往往由此一端出发，借着天、地、人的大舞台，或放纵笔墨，或精雕细刻，或娓娓而谈，与天与地与时间与人皆可推心置腹。做到这一点自然不容易，那才是大手笔。何来大手笔？我之愚见，善于读书是头等大事，纪实家们面对现实的纷繁、复杂，多读一些文学以及文学以外的书籍甚为必要，否则何来广博的胸怀呢？

读书不仅有益开拓视野，也有助我们驾驭语言。

记得1983年湖南打算整修岳阳楼，有关方面找丁玲写《新岳阳楼记》，俾与九百年前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古今争辉。策划者真是煞费苦心了。丁玲特为此事找我商量。要我出出主意，因为我对“厚古薄今”心有余悸。所以就劝丁玲鼓干劲、争上游。我说，范的原文只有344个字，稿费还不够吃一顿饭哩。范仲淹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儿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是具备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党员作家，理应后来居上。丁玲苦笑着说：“问题是超越那两句警句不容易。”我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说得好听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脱胎或点化诸葛亮所说的：“有难则以身先之；有乐则以身后之。”再可以推到战国时代的荀子所说：“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我们还可以上溯到春秋时代的老子：“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近似的意思，竟能在相因相承中溯源长达1000多年。采用语言，犹如



解释生活，因境遇而异，因时空而异，因主观情趣而异，因思想境界而异。归根到底，因作者的品质与文学素养而异。我曾有个公认博学的书呆子朋友，其实此公是个悲观的理性主义者。他经常以调侃、冷嘲或揭密的口吻，悄悄告诉我一些“千古文章一大抄”的新发现。其实，如何区别抄袭与点化，皓首穷经的某些学问家未必能搞清楚。

为了取得真知灼见，我们总是要走在泥泞的路上；

我们总是不能梦想着有人铺一条平坦的高速路直驶艺术殿堂。

或许这十位纪实名家自身以及他们笔下的人和事都说明了这一切。

这文库中严肃、认真而又斑斓多彩的纪实文学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应是我们这个时代于世纪交替前绘制出来的长卷之一。

一个永恒的纪实主题，也许是：人类要向何处去？

连日京都苦夏，昏昏然，今夜却有雨声敲打窗棂，率尔命笔，不暇辞饰，是为序。



目 录

第一部 希望工程纪实	(1)
引 子	(1)
第一章 一百万双饥渴的目光	(2)
第二章 烛光里的忧思	(39)
第三章 “希望工程”	(66)
第四章 蓝天下涌起一片爱潮	(78)
第五章 孩子，你们的未来不是梦	(128)
第六章 关于明天的话题	(148)
后 记	(159)
第二部 中国山村教师	(162)
第一章 沂蒙作证	(164)
第二章 从乌蒙山到赤水河	(198)
第三章 湘西备忘录	(225)
第四章 情在巴山蜀水间	(246)
第五章 神圣之忧	(263)



第三部	首例农民告县长案始末.....	(272)
上	篇.....	(272)
中	篇.....	(296)
下	篇.....	(346)



希望工程纪实

引 子

把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武井士魂先生，作为我创作这部报告文学的最后一个采访对象，我是想，人家毕竟是联合国资深官员，毕竟是教育方面的权威，请他谈谈对“希望工程”的看法，或许更具权威性，更具客观性。

担任我们之间翻译的是日本共同社（北京支局）记者河野先生。去年十月二日，为了报道中国的“希望工程”，河野先生赴广西平果县采访，亲眼看到了贫困地区儿童对知识的渴求，感受到了“希望工程”的深远影响。当要离开海城乡新民村时，河野先生把他身上剩下的所有的钱，全部捐献给了那里的失学的孩子们。

采访的范围是广泛的，我请武井士魂先生介绍了当前全世界的教育态势、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现状、他对中国教育的感受，当然，重点还是请他谈谈对中国正在实施的“希望工程”的看法。

河野先生的翻译始终带着激情。

离开武井士魂先生的寓所，我看了看表，正好是一九九二年



七月十四日下午四时整。

北京上空悬着一轮红彤彤的太阳。

耳旁依然在响着武井士魂先生的话音：“……其他国家也有过类似的救助失学少年的活动，但他们主要是借助于外力，借助于他国或国际社会的宗教或慈善团体。而贵国的‘希望工程’，则主要是依靠贵国自己的民众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贵国的‘希望工程’具有世界意义的独创性……”

一九九〇年九月三十日，联合国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提出了“儿童优先”的原则，要求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让地球上的每一个儿童都受到基本教育。

这是一项激动人心的宏伟的目标，不过，对于每年有数以百万计失学儿童的中国来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却又充满着艰难。

或许，正因为艰难才有了“希望工程”……

第一章 一百万双饥渴的目光

又回来了，又回到了古老而又现代的北京。仅仅是在两个小时前，我还站在黄土高原的中川机场上，拥挤着我的是焦旱赤裸的山岭和满目的苍凉。

明媚和煦的三月阳光，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

一切都显得不怎么和谐。

从首都机场开往城里的豪华型大巴的扬声器里，传出了《黄土高坡》，歌者唱得慷慨激昂。我想，唱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必定没在黄土高坡住过，否则，她绝不可能唱得这般潇洒。

大街上行人匆匆。大巴在东单路口停住，一队穿着天蓝色校服的小学生，从车头鱼贯而过。这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不必为每



学期几十元学费而发愁，不必为买一只文具盒、几本课外书或一件什么玩具而费心。在中国，他们称得上是幸运儿。

刚进家门，便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她责怪我为什么不能早几天回来，否则，可以赶上她宝贝儿子的生日。她说，过生日那天，孩子爷爷送的那只蛋糕，是专门在一家四星级饭店订的；姥姥送的玩具枪是托人从香港买来的……面对琳琅满目的礼品，儿子对她说：“妈妈，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先挑哪件好？”

那几日，我老爱痴痴地望着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女儿，女儿发现了，便问我：“爸爸，你怎么老盯着我？”

痴痴地望着女儿，心头老在琢磨着那个古老的命题——什么叫命运？

生在北京楼房里的是北京孩子，降落在陕北窑洞土炕上的是陕北娃儿。对于命运的注释，还有比这更通俗、更准确的吗？

五个少女的灰色故事

北京切诺基抬着头，艰难地爬行在几乎成四十五度的陡坡上，好几次它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不得不停下来歇一会儿。

我不无担忧地问身旁的司机：“能行吗？能上得去？”

小伙子却显得极自信：“放心，我是百色地区正规驾校毕业的。”

十里山路，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切诺基驶进了平果县新安乡汤那屯。或许是难得有人开着小车到这里来，一大群孩子怯生生却又好奇地围了过来，村民们三五成堆，也远远站在一旁指指点点着。

我的脑际闪过的第一缕思绪是：原来广西并非到处都是桂林山水，原来广西居然还有这么贫困的地方！



正赶上开学的第二天，小学校王尚松校长告诉我，全校一百二十九名学生，来报名的只有八十人，交了费的还不到一半。

我问：“一名学生每学期收费多少？”

王校长说：“一、二年级书本费加学杂费是十八元，三、四、五年级十九元。不过，我们这里书本一般只买语文、算术、思想品德，像自然、地理、历史、音乐、美术都不买，不是不想买，是买不起。”

“这些副科都不上了？”

“只能这样。”王校长叹了口气。

一二十元，对于城市孩子来说，不过是买一件玩具的钱；但在这里，对于多数家庭却是不轻的负担。特别是那些有两三个孩子同时上学的家庭，负担更像山一般沉重。

“九分石头一分田”——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全村三百六十九户人家，去年的人均收入还不到一百四十元，人均粮食仅只一百四十公斤。解放四十多年了，村里至今仍不通电。普查人口时曾做过统计，全村二千零十八个人，四十五岁以上的除了村长、会计等五个人稍识几个字外，其余的全部为文盲。

我提议到几位交不起学杂费的学生家看看。

农加学家原先住的是土改时分的地主的房子，去年八月塌了，父子俩（农加学父亲农上团因贫穷至今未娶，加学是他领养的）四处打“游击”，亲友们实在看不下去，刚刚帮他们盖了一间木房子。

这里的木房子分上下两层，下层养猪或养牛，上层住人。空荡荡的屋里四面透风，找不到一件能值十元钱的稍像点样的家具。

农上团才不过四十五岁，却满脸是黝黑的皱纹，佝偻着背。我问他去年的总收入，他掰着手指头算给我听：承包的两亩山地打了六百斤玉米，卖了三只鸡得了十九元钱。



“除了这些再没其它的?”

农上团摇了摇头。

“六百斤玉米哪够吃一年?”

农上团说：“去年我们吃了三个月国家返销粮，修房子还借了四百元贷款。”

一旁的王校长告诉我，这里的村民一年到头都喝玉米粥，一般是早晨起来熬一锅粥，全家人喝一天。说着，他走到锅台前，掀开锅盖，果然可见半锅结着锅巴的玉米粥。

我冒了一句：“光喝粥多不经饱，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北方人那样做成窝窝头吃?”

农上团忙说：“那种东西没吃过，恐怕会吃不惯。”

王校长接过话头：“我看不是吃不惯，而是不经吃。一斤玉米面熬粥能熬大半锅，做窝窝头却做不了几个。”

我说：“老农，你才四十五岁，正是干活的时候，农闲时可想法到外头找点活干!”

“我?”农上团指了指自己，“到外头去?”

“对，做点小生意，或者给人家打工。”

农上团的头摇得像拨浪鼓：“山里人，做生意，不会，不会!再说，我走了，这个家怎么办?房子叫谁看?”

我心想，这么个穷家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我们又来到梁盛炳的家。建在山脚下的两间木房子，有一面连山墙都没有，用几张破竹席围着。屋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贴着的一张毛泽东的画像和一张孩子得的奖状。

梁盛炳全家五口人，去年只收了八百斤玉米，加上乡里分给的五百斤返销粮，还缺一大截。这才刚刚开春，就已经快断粮了。三个儿子，老大念小学五年级，老二念四年级，老三九岁了，还



在家呆着。

这时，老三躲藏在他父亲身后，用一双惊奇的眼睛悄悄望着我们。

我对梁盛炳说：“老三都九岁了，得想想办法让他去念书。”

“念书是要紧，吃饱肚子比念书更要紧。老大、老二的学费已经够我发愁的了，老三，”梁盛炳低声说，“实在是顾不上了。”

返回的路上，我问王校长：“你这一百二十九名学生，估计最后要流失掉多少？”

“好好再做做工作，恐怕还得二、三十名来不了，主要是女生。”

“为什么？”

“村民们重男轻女，觉得女孩子将来反正是人家的人，念不念差不多。一般女生念到四年级、五年级就不让再念了（这里的小学是五年制）。 ”

我又问：“上学期四年级的女生，这学期有几个没来？”

王校长说：“一共就七个女生，来报名的只有两个。”

“那五个就不来了？”

“每家我都去了，家里都说缺钱，负担不起。”

我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见见这五名已经流失的女学生。

电子不大，王校长不一会儿便让人把她们喊来了。

梁红亮、王笑荣、王雪莲、农英明、王美爱，五个女孩儿站在我们的面前，显得有些拘谨。

她们当中最大的是王美爱十四岁，最小的王笑荣才十一岁。早春二月，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可她们没有一个穿毛衣或绒衣，都只穿着薄薄的单衣。

王校长在一旁插话：“刚才，听说北京来的记者要见见她们，她们都换上了最好的衣服，这是过年过节穿的，平时舍不得穿。”



我问她们到过县城没有，她们都摇头。

我问她们坐过汽车没有，她们也摇头。

我问她们平时在家都干什么，梁红亮回答放牛，王笑荣回答上山砍柴，王雪莲回答打猪草，农英明回答砍柴，王美爱回答一边放牛一边砍柴。

我说：“叔叔给你们出一道题：你们现在最想的是什么？”

梁红亮、王笑荣、王雪莲、农英明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想读书！”

王美爱想了想，低声说：“我想读书，可是家里没钱。爸爸说：‘没有饭吃，怎么读书。’要是读书不用钱就好了。”

我再也问不下去了。

走前，我还到王笑荣的家看了看，她的父亲王安壮对我说，他的四个孩子都该上学，加起来七、八十元的学费实在负担不起，想来想去只好让笑荣停学。

切诺基启动了，要走了。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又围了过来，村民们用漠然的目光望着我们，算是送行。

小车驶出了村口，将要拐弯时，蓦地，我看见那五位女孩子站在路旁，正向我们招手。

“停下，停下！”我喊了起来。

还没待车轮停稳，我便跳下车，急迫地朝她们迎去。

女孩儿们显然是哭了一场，一个个眼角挂着泪花，用一种饥渴而又充满着企盼的目光望着我，她们的嘴角噙着，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是该安慰安慰她们？还是该鼓励鼓励她们？一时，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沉思良久，我正欲说“孩子们，现在，我们国家还比较贫困，



过几年一定会慢慢富起来的”，却又止住了。要是她们说“叔叔，过几年，我们就永远失去读书的机会了”，我该如何回答？

我摇了摇头，分别握了握她们的手，再也没有勇气抬头正眼看她们一下，我觉得我自己，还有我们，都欠了这些山里孩子一笔债，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债。于是，便逃也似地回到车上。

切诺基转了一道弯又一道弯，我禁不住往窗外瞥了一眼，天呀，五位女孩儿依然站在山头，依然在向我们招手……

雨中访瑶寨

到新民村瑶寨采访，得先坐车到海城乡，然后还得走十五里山路。

车上，陪同的团县委书记小梁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六十年代，一位大学生分配到平果县，县里征求她的意见：是留城关还是到海城？她琢磨了片刻，心想，海城顾名思义一定是建在海边的一座小城，于是便选择了海城。可到海城一看，却原来是穷乡僻壤，她后悔不已。

春雨潇潇，从县城到海城乡七十公里，汽车走了快三个小时。果不其然，海城既不在海边，也无城可言。

乡教委办覃主任劝我：“天下着雨，又要爬山路，是不是改日再去？”

我说：“已经到了这里，还是去吧。”

覃主任见我态度坚决，又说：“那这么着，你们先吃点东西，到村里是拿不出什么东西好招待你们的。”

于是，我们闪电般提前吃了午饭。

出乡政府走不多远，便开始爬山。山道崎岖，且又下雨，极不好走。



覃主任向我介绍全乡的教育情况。这个贫困县里的纯少数民族乡（全部为壮、瑶族），学生的入学率仅维持在85%。全乡八十三所小学，一个教学点一名教师的就占了六十三所。其中离乡里最远的百潭村那个教学点，一名代课教师教了二十一名学生，到乡里开次会，来回要走一百里山路。

“我们这里的古光屯还办了所‘新私塾’呢。”覃主任说。

“新私塾？”我觉得有些新鲜。

“叫私塾，不准确，其实是群众自己办学。古光屯山高路远，不设教学点，学生到外屯上学要翻一座大山，来回二十里地，家长不放心。孩子们也不愿意到外屯上学，因为家里穷，都穿得很破烂，怕让人笑话。十几名学生差不多都流失了。上学期，村民们自己请来了一名初中生，办起了一个教学点。”

我问：“教师的工资怎么解决？”

“谈不上工资，屯里每年给三百斤玉米作为报酬，农忙时，村民再帮老师家干点活儿。”

“你们这里每斤玉米值多少钱？”

“国家牌价两毛二，市场价三毛八。”

我算了算，三百斤玉米等于一百二十元，这位教师每月的报酬只有十元钱。

覃主任点了点头：“差不多吧！”

十元钱，这还抵不上城里卖冰棍儿的老太太一天的收入！

走了两个多小时，出了一身汗，近中午，我们来到了这个寂静的瑶寨。

一排低矮的平房（三间教室），便是村小学。学校前的几株桃花不畏寒冷，开得正艳。没想到的是，教室的窗旁居然还贴出两幅鲜红的标语：一幅上写“欢迎中国作家来我校采访”；一幅上写